

道旁的智慧

——敬文東詩學論集

認識大陸作家系列



敬文東 著

道旁的智慧

敬文東詩學論集

認識大陸作家系列

敬文東 著

道旁的智慧

——敬文東詩學論集

作　　者 / 敬文東

主　　編 / 蔡登山

責任編輯 / 林千惠

圖文排版 / 鄭佳雯

封面設計 / 蕭玉蘋

發行人 / 宋政坤

法律顧問 / 毛國樑 律師

印製出版 /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

電話 : +886-2-2796-3638 傳真 : +886-2-2796-1377

<http://www.showwe.com.tw>

劃撥帳號 / 19563868 戶名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讀者服務信箱：service@showwe.com.tw

展售門市 / 國家書店（松江門市）

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

電話 : +886-2-2518-0207 傳真 : +886-2-2518-0778

網路訂購 / 秀威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bodbooks.tw>

國家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>

圖書經銷 /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

114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、32 號 4 樓

電話 : +886-2-2795-3656 傳真 : +886-2-2795-4100

2010 年 10 月 BOD 一版

定價 : 480 元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【代序】

豐益橋的夏天

敬文東訪談錄（2009年5月9日，北京梅所屯村。）

張後：這個訪談好像和題目無關，但正是這樣一個汗流浹背的季節，詩人兼北京著名的美食設計家刀（本名楊展華），指引我找到你的博客，我發現上邊登載的詩歌，大都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，進入到新世紀以來的很少，我納悶和好奇的是，為什麼會這樣？我也曾有一些朋友和你差不多，停止詩歌寫作長達十年，但後來一旦他們的境遇和心境得到改善，不約而同的又回歸到詩歌上來了，難道你自願放棄詩歌寫作了嗎？

敬文東：我和你說的那些詩人朋友的情況完全不同，只是這個事情說來話長。1980年秋天，我上初中一年級的第一個學期。那時有一首流行歌曲，叫《八十年代的新一輩》，鼓勵我等為「四個現代化」努力學習。那首歌我至今會唱。我算得上正宗的八十年代新一輩，因為那一年我不足十二歲。北島、劉小楓那些比我年長十多歲的人是八十年代的老一輩，李澤厚、高爾泰那些比我大三十歲左右的人是更老的一輩。我受惠於以上兩代人，我一直對他們心存感激之情。八十年代是一個全民支持讀書、仰慕讀書的時代，至今我依然認為，在共和國整整一個甲子的歷史上，八十年代是罕見的黃金時代。

我們的班主任充任我們的物理老師。他姓趙，諱治林，剛剛從川北一所師範學校畢業，也就是二十四五歲的樣子，但他那個年齡的人在八十年代開初處，往往都是些經歷豐富的人。因為我小學升初中的成績是第一名，所以趙老師對我非常好，我們至今還有很密切的往來。因為我們的師生關係，他同我父母之間交情很深。現在

想來，這樣的事情真是令人感慨良多。那時的老師和今天的老師一樣，也是「勢利眼」。只不過那時的老師偏愛學習成績好的學生，現在的老師寵幸有錢人或有權人的後代。我不知道哪一種「勢利眼」更好或者更壞，但我寧願選擇趙老師的「勢利眼」，這倒不僅僅是因為我從他那裏得到了太多的關愛，而是因為他對知識的授受懷有一種發自本能上的熱情。那年秋天，初中的第一個學期，從趙老師那裏，我讀到了一本跟愛因斯坦有關的薄薄的小冊子，按現在的出版規模，恐怕連「書」都稱不上。那本書是誰寫的，是哪家出版社出的，我早已忘記，但它給我帶來的激動卻讓我至今記憶良深。書上的兩句話把我震暈了：「上帝創世以後，牛頓讓世界清晰，愛因斯坦卻讓世界重新變得模糊。」（大意如此）從那時起，愛因斯坦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。在為期六年的中學時代，我斷斷續續讀完了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三卷本《愛因斯坦文集》。第一卷是純粹的科學論文，我完全無力读懂，但每一頁都翻過，因為我實在是太熱愛愛因斯坦。那些奇形怪狀的公式惹人遐想。二十多年後，我讀到過李澤厚先生的一篇文章，聽他稱愛因斯坦為千年偉人時，我加深了對李先生由來已久的敬意。因為對愛因斯坦的膜拜，使我把成為物理學家當做了那時的頭號理想。事實上，我的物理成績確實相當不錯，這讓那種理想變得更加熾熱起來。

也是在初中的第一個學期，我的語文老師向我推薦過一本發黃的新詩選。記憶中，那應該是「文革」前的選本。我的語文老師來自作為大都市的重慶。她的丰采在我們那個偏僻的川北小鎮上顯得十分打眼。她姓龔，諱亞華，是我漫長的求學旅途中少數幾位讓我崇敬的老師。我們至今還經常聯繫，她的一對兒女也是我的朋友。從她給我推薦的選本上，我讀到了艾青的《我愛這土地》，當時有一種想哭的念頭。那一年我不滿 12 歲。今天想來，我覺得自己很幸運，能遇到那麼好的老師，能得到他們不求任何回報的偏愛，以至於能通過他們，同時接觸到科學和詩學方面的偉大人物，想成為一個詩人在那時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科學論文在那時當然寫不出，但

胡謌一些貌似詩歌的句子，卻是很簡單也很讓人激動的事情。我當時這樣看待物理學家和詩人之間的關係：把物理學家當職業，把寫詩當業餘愛好。在那時，「學好數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」，是莘莘學子們共同供養的信條。因此，文科即為「瘟科」就是絕好的對仗。既當物理學家又當詩人的自我設計和自我安排，確實是我那時的全部熱情之所在。在四川大學上學時，我被國家招生制度安排學習生物學，但我對這門偉大的學科竟然毫無興趣，於是天天寫詩、抽空去物理系和數學系旁聽功課，以至於被我的同學視作不務正業。但不到一學期，我就意識到，物理學家的夢想此生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成為一個詩人也許還值得一試。我上大學那個時期，成都是詩歌的聖地，那些現在聽來如雷貫耳的名字經常在眼前晃蕩，他們寫下的分行文字讓我激動不已，甚至夜不能寐。但我那時十分羞澀（直到今天，羞澀仍然是我的內心常態），跟大多數年長我十歲左右的「第三代詩人」中的各路豪傑都沒有任何聯繫，寫詩純屬個人地下行為，只遠遠打量他們並偷取他們的技藝。多年後，我很榮幸地認識了他們中的不少人，和其中一些還成了朋友。當我告訴他們我那時站在一邊偷偷仰慕他們的情景時，他們禁不住哈哈大笑。我理解他們的驕傲，我發自肺腑地為他們的大笑而欣慰。在大學的收官階段，為成為一個詩人計，我覺得有必要首先系統瞭解中國古典詩歌，於是跟川大中文系一位導師聯繫，希望能成為他的入室弟子。當他知道我的來歷和生物學背景後，當面表達了對我的不信任。我至今記得他嘴角露出的幾絲不屑。這位如今名聲很大的禪宗研究者對我說，古代文學很難，你可以去考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。現在想來，他對我的不屑是正確的。我聽取了他的建議，最後修習了這個被學界普遍認為膚淺之極的專業。

第一次對自己成為詩人感到沒有信心，大約是在碩士階段，時在 1992 年至 1995 年，儘管那幾年我寫了不少詩，儘管那時我還憋著一口成為詩人的長氣。我隱約覺得，幾年前的物理學家之夢破滅後，現在該輪到詩人之夢破滅了。人貴有自知之明啊，從那以後，

我一直知趣地把重心放在讀書和所謂的學術研究上面，詩歌寫作被降低到業餘愛好的地位上。因此，我和你說的那些放棄詩歌寫作多年後，又重新撿起詩歌寫作的人完全不同，因為我從來就不是詩人，至少我自己從來沒有把自己當做詩人。和物理學家一樣，詩人在我心目中有著極為崇高的位置，我不能濫竽充數去玷污這個名號，也不願意詩人這個名號因為我的冒認而蒙羞。一般來說，作為一個渺小主義無可奈何的崇拜者，我對自己的個人生活很滿意，對自己曾經做出的人生選擇並無過多悔恨，如果要說遺憾的話，那就是我沒能成為一個物理學家，沒能成為一個詩人。生活就是一部潰敗史、妥協史、激情的消逝史，我或許應該平靜地接受生活與命運的安排，儘管直到今天我還在偷偷摸摸地寫詩。

和很多朋友一樣，我對季節、年齡也很敏感。2008 年 12 月，我滿 40 歲。當我的朋友和家人為我過生日時（我平時基本上拒絕過生日），我確實嚇了一大跳。40 歲，這是我上中學時做夢都想不到的年齡，沒想到這麼快就降臨到我頭上，根本就不問我同意還是不同意，而我身邊確實已經有一些熟識的朋友匆匆離去了。我在心中悼念他們，為他們，也為被時光打敗的自己感傷和惆悵。一過四十歲，做的夢都和以前不一樣，當年的萬丈豪情和高遠理想早已成為灰土，想來真是不可思議。孔子說，四十而不惑。我現在卻是疑惑越來越多，不知道來這個世界究竟要幹什麼，幹這些事情又有何意義。我之所以熱愛詩歌和科學——這是我崇敬加斯東·巴什拉（Gaston Bachelard）的重要原因——就是因為這兩樣東西值得追求，它們能幫助我把空白的日子有趣地填滿。生活總是充滿遺憾和無奈。如果有來世，我祈求上天能給我一個彌補此生遺憾的機會。這樣的祈求是不是有些過分？公然向造物主提要求是不是太狂妄？我不知道，但我請求它老人家原諒。

張後：這幾年你似乎完全沉浸到學術領域裏去了，你對當今詩壇不再有所關注了嗎？談談你所瞭解的詩壇現狀如何？

敬文東：其實，自 1992 年起，因為上膚淺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，我就開始沉浸到所謂的學術研究領域裏了。儘管有一

種被蹂躪、被脅迫的感覺，但總體上並不覺得屈辱，反而心懷感激。「樂不思蜀」、「反認他鄉做故鄉」其實是正常之極的心態，不值得從道德—倫理的角度大動干戈。但即便如此，我的創作夢至今未曾完全破滅。人就是這樣，對於一件想擁有卻最終錯失的東西總是懷有非份之想，創作夢還存留一些餘緒是無可奈何的事情。我想，你肯定願意同情這種處境。

我對人文學術有自己的理解，可能這種理解在今天還有些不合時宜，但我不準備為此感到慚愧。我不相信學術僅僅是書齋產物，也不相信學術僅僅是純粹的邏輯演算，我更願意相信學術關乎真實的生活，關乎個人情懷，關乎個人經驗甚至命運。我尊重書本，也勉強算一個書蟲，但我尊重的是同生活、同個人情懷、經驗與命運互相印證的那種書本；或者說，這是我一貫的閱讀方法。這樣說是不是有一點王婆賣瓜的嫌疑？但我確實不相信有超越於具體人生之上的人文書本。康德（Immanuel Kant）和維特根斯坦（Ludwig Wittgenstein）的書我是這樣理解的，孔子和魯迅的書我是這樣理解的，對我認識的少數幾個甲骨文字也是這麼理解的。我知道，我這樣做註定要受到打擊。報應來得不早不遲。三年前，在一次所謂的學術會議期間，一家著名學術刊物的編輯很坦蕩、很豪放地對我說，你的文章不合乎學術規範化。我也很直率地告訴他（只是沒有像他那樣富有搖滾精神）：自我進入所謂的人文學術那一天起，就沒有將所謂的規範化放在眼裏。你是不是覺得我這樣說純粹是為了給自己壯膽？我不這樣認為，因為我有自己的規矩，我從來不曾想到要越過自己定下的規矩。規範化是個什麼玩意？不就是行規麼？不就是外行們聽不懂的黑話麼？由於科學主義大肆盛行，人文學術研究者其實非常自卑，很樂於要向科學化靠攏。說穿了，所謂規範化，就是要為人文學術求得表面上的科學性。我斗膽對此嗤之以鼻，同時也覺得規範化確實很有幾分古裏古怪的幽默感，因為它始終在為成為它不可能成為的東西而努力。作為一個勉強知道也能運用幾條科學定理的人，我根本就不相信人文學術會是科學。為人文學術尋求科學外衣的做法是愚蠢之極



的行為。我當然有自己的學術問題要解決，我自然也有我的學術追求，儘管這在學術得道者們看來完全是微不足道的東西。我對自己從事的學術研究很謹慎，只有在我確信自己面對的學術問題值得我去面對時，我才會全身心地投入。這些問題不說也罷，因為它很沒意思。我只想說，當學術規範化和真實的、噬心的問題發生衝突時，我寧願犧牲規範化，犧牲那些頗具幾分搞笑性質的行規。我對自己的評價是：我勉強還算一個守規矩的人，還有自己的學術道德，最起碼沒有像某些赫赫有名的學術大腕那樣去抄襲，並且捉姦都捉到了床上還死不認錯。這也是無聊的話題，不准抄襲和不准偷盜不是一樣性質的問題麼，有什麼值得誇耀的？

因為學業的關係，我曾經做過一點微不足道的詩歌批評，想想都是十年前的事情了，現在偶爾也當當票友，而在我有限的朋友裏邊也是詩人、詩歌批評家居多。我不敢說多麼瞭解詩壇現狀，但我對當今詩壇有一點膚淺的觀察卻是真實的，至少我那些朋友們給我透露了不少消息，好的壞的都有。人生苦短，我只關心值得關心的詩人，就像我只關注值得關注的朋友，只是值得關心的詩人在數量上，隨閱讀面的擴大在不斷增多。我願意斗膽標榜自己從來不是一個狹隘的人，我也確實在時時提醒自己決不能成為一個狹隘的人。雖然我可能有自己的詩歌口味，但我不同意如下獨裁說法和皇帝口吻：只有合乎自己口味的詩作和詩人，才是好的作品和好的詩人。對於任何藝術作品來說，從來只有兩種：好的或者壞的。只是判斷好作品或者壞作品的標準，要依靠一個判斷者的個人才能。但個人才能是一個神秘的問題，此處姑置不論。我有一個也許不準確的觀察：許多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出生的詩人被批評界嚴重忽略了，當然其中一些也被嚴重高估了。這一批詩人中有不少人是出類拔萃的，詩歌批評對不起他們。和詩歌寫作比起來，懂行和夠格的詩歌批評家和批評文本實在太少太少。除了批評才能的缺失外，另一個原因很可能是，和其他行當一樣，詩歌也幫會化了，詩歌的既得利益者們（他們往往是「前輩」，現在正忙著「奔六」、數錢和收集頭

銜與榮譽），不屑於面對更年輕的一輩；而更晚一點出生的詩人或批評家，卻正在思謀著如何打倒六十年代後期出生的詩人。中國詩歌中的弑父、弑兄情結和尊老而不愛幼的傳統同時並存，這無論對詩歌寫作還是詩歌批評，都是極大的傷害。在此，我不得不說，批評更可能是個倫理—道德問題。除此之外，我理解的批評是一種再創造，它不負責指導詩歌寫作，也不僅僅負責解讀詩歌作品。作為一種特殊的工作，詩歌批評和詩歌寫作是平行關係，兩者在互相對視中讓自己頓悟並趁機提升自己。這才是所謂「雙贏」的理想局面。我心目中批評家的典範是本雅明（Walter Benjamin）和巴什拉。一個優秀的批評家必須具有自己的哲學體系，僅僅懂得一些鑒賞知識是遠遠不夠的。我們今天有不少很好的詩歌作品，但沒有多少夠格的詩學體系。在我對當今詩壇的觀察中，這種情形最令我吃驚。儘管有很多人被認作批評家，那些批評家也確實在意氣風發地忙於指點江山的勾當，但是很顯然，那純屬誤認和沒有自知之明。作為一個資深的詩歌愛好者或者詩歌票友，我覺得批評家的基本道德是：不關心爛詩和爛詩人，應該任他（它）們自生自滅，其他的詩歌現象，就讓媒體去炒作吧，與真實的詩歌批評沒有關係。

張後：我讀過錢理群寫過的一本書《與魯迅相遇》，我從你博客上的文章中感覺出來你對魯迅的研究也頗有心得。看來研究魯迅的人，一直沒有斷過，現在可不可以稱作這是一門「魯學」？有人說魯迅的早逝有幸與不幸的一面，你對魯迅的歷史位置是怎樣看的？如果他仍活在當今會怎樣表現他的刀筆功夫？

敬文東：錢理群先生是真正的魯迅專家，我不過是對魯迅有點體會和感想而已。同許多魯迅研究者不一樣，錢先生對魯迅是真誠的。我曾當面向他請教過。儘管我不贊同他的大多數觀點，但我相信，他相信自己說出的那些同魯迅有關的話。如你所知，我不是魯迅專家。事實上，自從我涉足人文學術以來，從來沒有成為任何專家的癡心妄想，當然最終也沒有機會成為任何行當的專家。在這個專家橫行的時代，我知道這是在自尋死路。對此，在一本即將出版



的自選集的序言裏，我斗膽申明過：「我似乎從來就不是一個遵照營業執照劃定的範圍進行學術經營的人，我就是願意在賣羊肉時偶爾越界去賣淫。但你管得著嗎？」不過，這種故意破罐破摔的行徑不值得額外申說，因為這純屬個人不良愛好。

我寫魯迅那本書完全出於意外，那是鍾鳴約我寫的。上世紀最後幾年，鍾鳴是多家出版社和多個作者之間熱情的月下老人。關於魯迅他一個字沒弄，卻把我成功地拉下了水，因為直到今天，我對他的寫作才能都十分迷信。完成關於魯迅的那本書，差不多已經有十年了。十年間，這本書一共有三個版本，最近出了個臺灣版。我的想法是，既然已經把它炮弄出來了，無論質量高低，都應該儘量多地為自己換點酒錢和煙錢。像我這樣一個毫無外援的書桌愛好者，這點小想法不應該受到責備吧？當然，作為一個正宗的窮人，我也不怕把自己的這點潛意識弄到桌面上讓別人觀看。儘管我對魯迅的看法和絕大多數「魯學家」很不一樣，但我仍然和他們一樣相信，要想理解 20 世紀的中國，魯迅是繞不過去的，他是我們解剖 20 世紀中國難得的標本。從很早開始，我就一直把自己當學徒看，寫魯迅和寫其他書或文章一樣，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。和通常的學生相比，我可能是一個比較挑剔的學生。即便是我崇敬的人物，我也希望自己有能力看出他的弱點。依我看，這是學習的本義，也是促使自己進步的有效途徑。不是說我看出了他們的弱點，我就比他們更聰明。我應該還沒有傻到這種程度吧？

今天的「魯學界」所做的工作，與其說是在弘揚魯迅，遠不如說是在成功地消滅魯迅。在他們筆下，魯迅偉大和完美得實在令人厭惡。但這種局面的得來和魯迅無關。我對「魯學界」有一點十分膚淺的瞭解，所以我不喜歡那個「界」。大多數研究者和研究論著除了封他們（它們）為「瞎胡鬧」、「瞎扯淡」外，我不知道應該怎樣給他們（它們）命名。當然，「魯學界」如此囂張和跋扈，跟長期以來的政黨意識形態有關。對此，我沒什麼好說的，畢竟願意跟著權力跑是中國人的古老天性。政治是一門學問，它叫政治學；但政黨

意識形態不是學問，它僅僅是一種實用主義式的操作策略而已。學術研究沒有必要清除政治學，但有必要遠離通行的政黨政策。政策是關乎國計民生的操作指南，學術研究完全沒有必要去企及那樣的高度。在寫那本書時，我不斷提醒自己，一定不能充當政策的傳聲筒，要最大可能地獨立於各種稀奇古怪的權力。作為一個普通人、一個普通的研究者，我能做的只有這麼多。

魯迅是一個複雜的人物，遠不是教科書和「魯學界」理解的那麼簡單。除了錢理群、汪暉、王富仁、孫郁、王曉明等少數幾個人，我甚至認為「魯學界」中的絕大部分不配研究魯迅。也許我提到的那幾個人本來就不屬於通常所說的「魯學界」？魯迅有缺點，有偉大的一面，也有不那麼偉大的一面，但他註定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大人物。他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或許是個人的獨立——其他的重大啟示現在暫時不論——但我不認為這個啟示是成功的。比如說，一位「魯迅研究會」的頭面人物，在該會改選落選後（也有人說他本來就到了退休年齡），還死死握著「魯研會」的公章不願交出。公章是命根子啊，類似於男人胯下的陽物和帝王案頭的傳國玉璽，是不能輕易拱手相送的東西。這種讀了一輩子魯迅，卻如此迷戀權力的變態分子，正好能說明魯迅的啟示遭到了怎樣的慘敗。我對魯迅的定位是：他是一個偉大的失敗者，他是現代中國體驗失敗最深的人物，也是在描寫失敗感方面最傑出的人物。這是他的文字至今仍能強烈感染我們的最大原因。但更無奈的失敗還在於：失敗的魯迅死後還在繼續失敗，他的著述甚至沒有能力教育他的崇拜者。至於魯迅死得早究竟是他的幸運還是不幸，徵之於當代史，我覺得答案不難給出。在此，我願意引用兩個人的話，來暗示那個不難給出的答案。一個是魯迅對他的共產黨朋友說的：如果你們成功，第一個要殺的人肯定是我。——當然，聽者一方對此表示了明確的反對。另一個是毛澤東在「反右」時說的：如果魯迅今天還活著，他要麼顧全大局，要麼去他該去的地方。——當然，毛澤東願意相信魯迅是顧全大局的。很好玩，不是麼？

張後：我問你一個無聊的問題，你說學院派和草根一族究竟有什麼樣的鴻溝？每每看見他們在網上掐得你死我活，就很不舒服，他們的立場一定是對立的嗎？有沒有一個緩衝地帶存在呢？

敬文東：我上網一般是收、發郵件，除了去幾家信得過的學術性、思想性或藝術性網站外，其他地方基本不去，也幾乎從不在網上跟帖、留言。我沒有那個閒工夫，再說，我在網上說的話頂多只能算是放屁，毫無意義，因為網上根本就沒有民主這頭怪獸存在。我覺得活在今天不讀報、不看新聞，完全不影響我的個人生活。什麼是個人生活？老婆孩子熱炕頭而已。那些形勢一片大好的說辭我以為還是少聽為妙、不聽最妙。因此，你說的那種情況我沒有在網上看到過。我雖然是學院中人，但也有不少朋友是非學院中人，他們對對方的總體看法我倒是不陌生，你說的那些情形我也有耳聞，只是從未深究過。

一般說來，非學院中人十分討厭學院中人引經據典過多的不良習氣。好的說法是挾洋人、古人以自重，不好的說法是「裝 X」。學院中人呢，卻又認為非學院中人匪氣過重，說話不嚴謹，好情緒化，同樣有「裝 X」之嫌，只不過要從相反的方向去理解「裝 X」。應該說，他們指斥對方的那些情形都是存在的。這種相互攻擊的情形雖然很普遍，其實無關緊要。在當下中國，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倒是值得關注：無論爭論的是多麼嚴肅甚至重大的問題，最後總會經由情緒過度變形而成為人身攻擊。似乎我們直到今天，還沒有能力營造出一個就事論事的輿論環境。其實，只要我們瞭解古代史，這根本就算不上什麼新鮮事。我經常聽一些同胞沾沾自喜地說，我們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，連美國都對我們懼怕得不得了。作為一個中國人，我很願意相信這是真的。但理性告訴我，這的確是假的。連最應該有理性的知識份子都沒有成為有理性的現代人，面對重大問題最後都要落實到人身攻擊上去，這會是一個現代國家的做派麼？我們最多不過是一個暴發戶而已。一個暴發戶在中國可能會受到追捧，但在有教養的人那裏，是最沒有檔次的。我不喜歡爭論，倒不

是因為我覺得爭論沒用，而是我信不過當下中國的所有爭論。真理愈辯愈不明，直到最終丟失了真理、根本不在乎真理。

學院當中存在著有見識的知識份子，非學院中也有有見識的知識份子。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情。但有一個大背景我們不能忽略：在迄今為止五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上，國朝才是知識份子潰敗得最為徹底的時代。儘管學院和非學院中都有有見識、有良知的人，但考慮到大背景的存在，我們就沒有任何理由樂觀。因此，在他們爭論時是否有一個緩衝地帶反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知識份子該怎樣培植自己獨立於權力的意識、能力和道德觀念。有一位很有名的經濟學家說，自行車帶來的污染比汽車帶來的更大；另一位經濟學家說，中國沒有窮人，只有待富者；還有一位學者說，上訪的人中至少有一大半患有精神病症，應該入院治療。聽到諸如此類學院專家們的言論，網路群眾憤怒了，討伐之聲和辱罵聲不絕如縷。但不知網路群眾——也就是你所說的「草根」——考慮過沒有，在今天能通過四拼五搏、七拼八湊成為專家的人，肯定有他的過人之處，他們怎麼會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呢？儘管說這些話的人大多都是你我一樣的平民後代，根本不是貴族，但人家有志於為自己的後代提供貴族身份——這恐怕才是問題的七寸之所在。他們在說這樣的話之前，肯定有過周密的算計，甚至把群眾們的憤怒和討伐之聲都計算進去了。周密算計之後還要冒犯群眾，那是因為群眾可以冒犯、值得冒犯，那是因為冒犯「屁民」之後得到的賞賜，遠遠大於討伐之聲帶來的壞處。冒犯群眾是利潤的源泉之一。馬克思引用過托·約·登寧的話：「一旦有適當的利潤，資本就會膽大起來。如果有 10% 的利潤，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；有 20% 的利潤，它就活躍起來；有 50% 的利潤，它就挺而走險；為了 100% 的利潤，它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；有 300% 的利潤，它就敢犯任何罪行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。」那些精明之極的人生生意人，難道還不懂這些常識？「屁民」或網路群眾對此確實犯有失察之罪，他們顯然低估了人生生意人的智慧和膽量。就此而言，緩衝地帶要麼根本不重要，要麼根本就不存在。

只有當正義、公正成為一個社會的所有人（當然首先包括知識份子）信奉的頭號價值時，緩衝地帶才會出現、才能化為現實。你說，我們什麼時候才會擁有這樣的文化飛地？至少我對這片大陸的現身，懷有不由自主的悲觀情緒。

張後：你搞過金庸研究，我們可以談談這個問題。其實，我們都知道讀金庸梁羽生古龍等等的武俠小說時，它就是一首首詩歌（即成人童話），大可不必將武俠小說中的人物和生活現實化，那是自欺欺人的，就像詩人寫詩，千萬不要把詩歌和生活相混淆，那會走火入魔的，你說是嗎？

敬文東：好，反正是漫談，就順著你的話題說吧。不過，「研究金庸」中的「研究」二字顯得有些誇張。我不是金庸專家。新武俠小說中，我也只通讀過金庸的作品，梁羽生、古龍的只讀過一點點，不是很喜歡。「研究」金庸，是我上博士一年級時做過的一項工作，前後不到一年時間。時在 1996 年秋天到 1997 年夏天。當時的目的，是想通過金庸的作品，陳述我的中國文化觀。就此目的而言，金庸和他的小說不過是一個幌子、一件道具。但作為一個普通讀者，我確實很喜歡金庸的作品，至少它能給我提供一個逃避之地。某些勇敢的人生游擊隊戰士會諷刺說，你的逃避顯然是懦夫行為。我得含笑（而不是像余秋雨那樣「含淚」）勸告他：我看你也得給自己尋找一個逃避之處，這才是自己把自己當人看，何必一天到晚把自己搞得跟鬥士一樣橫眉冷對、勃起如鐵呢，老子可是早就說過，「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」。承認這一點我不認為有多難為情。但我還是既不願意高估金庸，也不願意像一些文學高潔之士那樣痛貶金庸。金庸怎麼樣其實跟我們毫無關係，追捧和痛貶都是多餘的。他的作品不就是迷魂湯麼？喝下去就得了。而我只願意將他當道具。作為一個膚淺專業的修習者，我有權將所有著作當道具。難道弱者就不能矯情和撒嬌？撒嬌是我輩弱者唯一的特權。

以我粗淺的生活經驗，恐怕只有傻瓜才會將武俠小說中的人物和生活現實化，但有意思的是，一些過於聰明的詩人確實在犯這樣

的低級錯誤，類似於足球運動中的烏龍球。較為明顯的一個病症是：首先在詩歌裏大肆鼓吹崇高，緊接著把自己崇高化，以至於接下來他以為自己真的很崇高，然後把所有人假想為低俗之徒，最後成功地把自己弄成了眾人皆醉他獨醒的屈大夫。儘管在讀者看來，他跟崇高一點實質性的關係都沒有，反倒天天在向奸商和對他略表關懷的官員示好、獻媚。每當我看到這樣的詩人哥們的如此行徑時，就忍不住想笑。我有一個很膚淺的經驗，一個沒有幽默感的人註定枯燥乏味；一個沒有自嘲能力的人最有可能成為自大狂。許多在詩歌裏自己為自己三上「勸進表」，最後得以自我稱王的傢伙，跟許多在詩歌裏不斷自我崇高化的傢伙一樣，都分不清抒情主人公之身份同生活主人公之身份的區別。他們的毀滅指日可待。

詩人是什麼？凡夫俗子而已，和我們身邊每一個討生活的人沒多大區別，頂多是革命分工不同——詩人名號的高貴不在於詩人的身份，而在於他的文字中透出的尊貴資訊。劉少奇以國家主席之尊，能對掏糞工人說這樣的話，我們的詩人能不能也假裝承認這一點？詩人當然可以說，我和賣菜的人不同；但賣菜的可不可以說我和寫詩的人不同？我們歡迎詩人像上帝那樣為我們思考，以便為我們提供精美的精神食糧（這是詩人名號之尊貴的由來），但為詩人的生命安全考慮，我們也願意善意地希望他能像普通人那樣生活，以免自我爆炸。我們可不會因為想要精神食糧，眼睜睜看著一些人為我們犧牲。作為群眾，我們還沒有卑鄙和殘忍到那個程度。自戀是人的天性，無論是人格自戀還是職業自戀，都可以得到原諒。但天性之所以是天性，它的根本涵義在於抑制而不在於過度提倡。艾略特（Thomas Stearns Eliot）的「逃避自我說」，或許就含有這個意思在內。沒有多少情形比「自己高尚而別人庸俗」更糟糕的了。較好的情形或真實的情形是：我們都是有缺陷的人，我們都在努力超越自己。人格的完善是一個學習的過程，詩歌是讓我們人格完善的通道之一，並不是只有詩歌才是人類的太陽。我們至少有十個太陽。面對它們，后羿的神箭註定無能為力，何況后羿從來就不是詩歌的守

護神。詩人、詩歌把自己定義為超人、太陽，至少哲學和神學將會提出嚴重的抗議。我敬重詩人的名號，但我還是覺得詩人和詩歌都應該更謙虛一點。過分驕傲和狂妄一樣，都會遭到天譴。

和意在譴責的詩歌相比，我更喜歡讚美詩。因為後者在今天更加難得，因為誠實的讚美詩在今天是可遇不可求的事物，因為誠實的讚美詩需要更多的善意、理解、寬容和詩人的個人才能與強大的心性。

張後：讀了你的《詩歌肖像》，你說：「詩歌，不過是愚人節的一個禮物罷了」，仔細想想，也有一定的道理，詩到底是什麼呢？沒有人可以說得清楚，有人說詩歌就是生活的雞肋，也有人說詩歌就是一個桃花源。誰知道詩歌到底是什麼呢？你從幾歲開始寫詩的？你為什麼寫詩？

敬文東：你說的那篇文章是我 1997 年寫的，都 12 年了，謝謝你還記得它。儘管那確實不算一篇好文章，甚至不值得你去記住，但「詩歌是愚人節的禮物」這個觀點，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至少有小一半是成立的。說詩歌是愚人節的禮物，和說詩歌是桃花源是同一個意思。詩歌是安慰，它讓我們能夠暫時逃避凡俗的、沒有詩意的甚至是難堪和難熬的生活。我不是詩人，只是一個詩歌愛好者，頂多算一個業餘詩人。所以，在談到我的詩歌時，你一定得記住，這是假冒了詩歌之名的詩歌。我胡謅出第一首詩時在 1980 年 10 月，記憶中是寫落葉的，我至今還記得那些很搞笑的句子。我之所以寫詩，是因為詩歌可以表達我的苦悶，最終讓我短暫地逃避苦悶，也就是進入到桃花源並自己愚弄自己、自己欺騙自己的意思。

我生於 1968 年冬天。父母是川北一個小鎮上的國家工作人員，天天緊跟北京城裏的毛主席忙於偉大的革命事業，根本沒時間理睬我們這些小兔崽子。因此，我在不到兩歲時，就被送往幾十華里外的爺爺奶奶家，由爺爺奶奶撫養。我在農村度過了一個幸福的、無法無天的、整個夏天都泡在河水裏的童年。那時的河流絕無污染，到處都是魚、鱉和烏龜，只要我們願意，隨時都可以將它們抓在手裏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那一定是我此生最快樂、最沒有憂慮的時光。